

# 近代福建与日本 的贸易及文化交流

□雷慧英

福建与日本的贸易及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早在明代以前,福建泉州与日本冲绳(时称琉球)的交往已很频繁,史称“彼此互市,若比邻然”。即使是在明初及明末清初,中国社会动乱不安,而封建统治者又施行严厉海禁政策的情形下,泉州与冲绳的交往也没有停止过,海上私人贸易仍十分活跃。据《安平志》载:“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三月,日本商船数十只,直来围头、白沙等澳停泊,四方土产货如月港新线、石尾棉布、湖丝、川芎,各处逐利商人,云集于市”<sup>①</sup>。不仅日本商人大批来华贸易,福州、福清等地也有很多商贾赴日本贸易并侨居日本九州长崎。到本世纪初,福建出现旅日的高峰期,在日本形成了华侨社会,在故乡则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侨乡。即使到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中期,赴日的福建留学生中仍是福清、福州、厦门、泉州人居多。本文试图就近代福建与日本的贸易及文化交流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作些粗浅的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被迫与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厦门、福州与广州、上海、宁波被强行开辟为通商口岸。由于福州、厦门两地航运历来比较发达,五口通商后,一大批外国商人、冒险家及其他投机分子接踵而来,商业

贸易更加繁盛,各国洋行林立。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借战胜之余威,也继西方列强之后,开始在中国各地设立洋行。例如,1901年日本在厦门设立三井洋行,专门经营进出口贸易。不久又设立大阪洋行,专门经营海上运输。当时福建出口的主要产品以茶、糖为大宗,进口以粮食、棉布为主。茶叶远销日本、南洋各埠。纺织品有进口也有出口<sup>②</sup>。当时有名的漳纱、漳绒就远销日本,受到日本民众的青睐。

甲午战争后,日本以武力割占我国台湾,并把福建划入其势力范围,日本轮船运输业便以台湾为根据地,向中国江海大举入侵。日本航运业在国家支持下与其他西方国家在福建海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根据福建三个开放口岸(福州、厦门、三都澳)海关统计,经由海关进出口船舶吨数,1899年合计达2607060吨位。其中,外国船舶2430334吨位,占93.22%;中国船舶176726吨位,只占6.78%。到了1911年,三个口岸合计3768136吨位,其中,外国船舶3172824吨位,占84.2%,而中国船舶595312吨位,占15.8%。就国别来看,1899年,英国居第一位,日本居第二位,中国居第三位。<sup>③</sup>从这一段的变化看,作为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则有后来者居上之势。

此外,根据统计资料,这一时期从厦门口岸入境的外国人数也很多,其中,1899年来自日本的乘客就达21人。1890年至1893年四年中,每年从厦门口岸入境的日本人分别为8人、4人、20人和17人<sup>④</sup>,从人数上也呈上升趋势。这种状况说明甲午战后日本为争夺其势力范围,加强了与福建的贸易往来。

众所周知,日清战争成为日本资本主义确立的大好时机,同时又因为从外商手中夺取了外贸主导权,大大促进了直接贸易的增长。从1894年至1897年,长崎的直接贸易与日本全国一样成倍增长。长崎港进口增长十分明显,这是长崎的福建华侨与福建贸易商的贡献。当时,长崎著名商号“泰益号”出口到厦门的商品有海产品、中药材、食品及杂货。其中海产品占重要的比例。1898年8月,日本水产讲习所技师山本胜次受日本农商务省水产局的委托,大约花了半年的时间对中国水产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据其报告书所述,厦门的水产品需求量甚大,泉、漳二府所消费水产品也是从厦门购进的。因此,厦门要大量从日本、南洋各地进口海产品。其中,鲍鱼、鱿鱼、墨鱼等产品几乎全是从日本进口的。此外,日本产的干虾、干鱼、海参也占很大的比例。

“泰益号”从厦门购买的商品主要有闽南地方特产以及华侨在婚丧等传统仪式上所需用品,购买量很零星,这说明其购买的目的是为了在日本国内销售。

另一方面,1899年日本国内成功地取消了外国列强的治外法权,许可外国人与当地人混合杂居,同时对新来的中国人则采取了严格的职业限制。这时期大批侨居日本长崎的福州、福清人囿于这种职业限制,在当地只能经营餐馆、卖布、理发(所谓的“三把刀”即厨刀、剪刀、剃头刀)等行业和其他杂业(小贩)。然而,正是在他们的辛勤努力下,福州、福清的旅日华侨的“三把刀”的绝活全部传到

日本,在日本各地享有盛名。至今在长崎、横滨的中国料理店还能吃上正宗的闽菜。

除福州、福清人外,闽南人侨居日本长崎的也不少,而且都是些贸易大户。例如泰益号的陈氏家族就是一典型代表。泰益号作为贸易商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在长崎闽南帮中处于领先地位<sup>⑤</sup>。1896年,在福建华侨陈发兴的苦心筹备下,兴建了长崎福建会馆<sup>⑥</sup>。1917年又在福建会馆增设了长崎福建联合会。目的在于通过会餐等活动加深会员之间的亲睦关系和促进贸易。会馆活动中,最大支出项目是举办祭祀航海之神妈祖的天后诞和清明节。还有,春秋两季举行的孔子庙祭活动等。

闽南帮贸易商在福建帮里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他们通过血缘关系以闽南这一地缘关系形成了环中国海商业网络。福州帮(尤其是福清人)华侨人数在长崎福建帮里虽占有多数,但由于他们多数人从事“三把刀”和杂业的缘故,决定了他们的地位,而福建会馆成员是由有一定地位的人组成,因此,闽南帮的富商在会馆活动中长期占有主导地位。

旅日华侨在与日本人民长期友好相处的过程中,出现了相互通婚的现象。当时,离乡背井到异国谋生的大多数是青壮年,他们因家境贫困而出外谋生,大都是独身一人前往。由于他们勤劳、吃苦、朴实,有的人被当地人招赘,例如日本福冈县久留米市的15户华侨,其中有4户与日本人通婚。据中国方面调查,仅福州帮侨乡150名华侨、侨属中,与日本人通婚的就有60例,其中华侨女性与日本男性通婚的有10例,即占16.6%<sup>⑦</sup>。

从上述福建与日本交往关系上,可以看出,近代的中日两国政府关系尽管已经出现恶化的走势,但是,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还是友好的、密切的。日本成了当时福建人的贸易中心和出洋谋生的重要目的地之一。

贸易往来常常是文化交流的先导,其实贸易本身便既是一种物质的交流,也是一种

文化的碰撞与交流。福建与日本的贸易往来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双方的互相了解及文化交流。

19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发动了一场戊戌变法运动,希望光绪皇帝成为中国的明治天皇,在中国实现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变法。可是,这场变法运动失败了,血的教训说明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1898年,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被迫亡命日本。1900年唐才常发动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又有一批反清志士流亡日本。20世纪初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因多次发动反清起义受到清政府通缉而到日本避难。这时有不少热血青年学生相从,也有青年学生为追随他们革命而到日本留学。再加上清政府提倡、鼓励赴日留学的政策<sup>⑥</sup>,于是掀起了留日热潮,为中日文化交流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中国这样的大气候影响下,福建也开始出现留日热,据统计,1908年9月至1909年7月自费生有27人,官费生21人;1909年7月至1910年6月,自费生38人,官费生21人,其他1人;1910年6月至1911年7月自费生16人,官费生16人,三年共派出140人<sup>⑦</sup>。就派出人数看,福建并不落后于其他省。其与日本的文化交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由于留学生经费等各方面的原因,当时有人主张在中国国内开设日语补习学校,教授日本语言文学,为青年学生赴日留学作准备。因此,居住在中国的一些日本人纷纷办起了日语学校。据载,福建各地先后办起了福州东文学堂(1898年)、泉州彰化学堂(1899年)、厦门东亚学院(1900年)等三所日语学校<sup>⑧</sup>。此外,在中国人办的新式学堂里还聘请日本教师,这些日本教师时称“日本教习”,当时福建的福建高等学堂、福建高级师范学堂、工艺传习所、农事试验所、福州幼稚

园、福州女子职业学校、厦门瀛厦书院等学校聘请日本教习上课<sup>⑨</sup>。他们除教授日语外,还教授他们从西方学习来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

二十世纪初叶,中日两国外交上冲突较少,两国人民的感情也比较融洽。在日本方面,“中国热”也持续高涨,到中国居住的日本人数由1899年的1725人增加到1905年的16910人。这些人当中有的被中国方面聘请为军事顾问、教育顾问、农事顾问。到中国来的日本教习中,有的人一边教授中国人学习日语,一边向中国人学习中文,准备从事中国问题研究。在这些来华的日本人中,有的看不起曾经留学日本的中国人,并抱有“开通中国人风气”的想法。但就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两国的文化交流还是比较融洽的。这些日本教习上课几乎全部用日语,需要留日归来的中国学生作翻译,从而也增进了相互间的理解。因此,可以说,留日学生在教育问题上的贡献和影响是很大的。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教习中,有的人对中国十分友好,在中国教书不取分文报酬,对那些上学有困难的学生给予资助。有的教习为维持学校开支,不辞辛劳地奔走,希望日本财团给予经济支持。福州东文学堂、泉州彰化学堂、厦门东亚学院为福建培养了一大批懂日语的人才,为福建与日本近代文化交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日间的文化交流使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新引进的日本近代文化发生激烈的碰撞。昔日的“小国”日本在学习西方之后迅速强大起来的事实促使中国人更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和西方科学的进步。长矛大刀抵挡不住洋枪洋炮,固守传统也难以应付巨变的时势。

正如时人所说的“中国这个衰老帝国,过去昏昏欲睡,奄奄一息,自从甲午一役以来,益为世界列强侵袭所苦,如今觉醒过来,渐知

排外守旧主义之非,朝野上下,奋发图强,广设学校,大办报纸杂志,改革制度,登用人材,欲以此早日完成中兴大业”<sup>⑧</sup>。福建许多青年或步入洋学堂读书,或在华侨的帮助下,开始走出国门求学。“教育救国”、“留学救国”的思想为广大青年学生所认同。由此可见,福建虽远离中国的政治中心,但是,在中日文化交流这一点上却和祖国的命运休戚相关,同样走在时代的前头。

另一方面,福建在日本的留学生和全国其他地方的留学日本的青年一样,深深地认识到只有学习效法欧美、日本,赶上世界发展潮流才能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而效法欧美、学习日本,传播西方的学术和思想,翻译西方书籍是一个最有效的捷径。因此,留日学生利用自己学到的日语和专业知 识编译国内急需的教材,翻译日本近代思想家、哲学家和有关学者论述日本情况的著作。他们在日本创办了翻译刊物,如《译书汇编》(1900年创刊)、《游学译编》(1903年出版)等。1904年,福建留日学生组织了“闽学会”,并发行《闽学会丛书》,以翻译日文书籍为主要宗旨,传播近代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该学会出版的第一部书是斋藤阿具著,闽县林长民译的《西力东侵史》。根据此书所刊闽学会的广告上所列,已刊书目还有王学来译的《哲学原论》,浮田和民著、刘崇杰译的《史学原论》,鸟居龙藏编译的《国际公法精义》,高凤谦编译的《泰西格言集》,有贺长雄著、萨端译的《社会进化论》,守屋荒雄著、杨允昌译的《国际地理学》。还有《近代外交史》(有贺长雄著)等已译未刊行书目9种<sup>⑨</sup>。

福建留日学生通过大量翻译日文书籍,传播近代西方文化,为祖国文化输入了新鲜的血液。迅速缩短了中国文化与欧美文化的距离,他们不仅带来了许多日本的新词汇,使古老的中国文化放发新枝,而且,也改变了中

国传统的文风,使传统的文章体裁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还为中国带来先进的印刷技术,推动了中国出版、印刷业的进步。例如日本造的汉字活字还销售到中国,189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成立时所用的印刷机器和活字也主要是日本的产品,由于印刷质量好而获好评。1900年8月,首批留日学生唐宝锷等编的日语教科书《东语正规》出版,采用了日本式的洋纸和表里两面印刷以及洋式装订,这在中国出版史上也是一个创举。1902年8月上海创刊的《新世界杂志》就是洋装本刊物,这是中国人在国内第一次采用洋装本的尝试。由此可见,福建留日学生与全国的留日学生一起,为推动中日文化交流谱写了丰富多彩的篇章。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

注释:

- ①庄为玘、庄景辉等著《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港口—泉州》,海洋出版社,1989年。
- ②《福建经济发展简史》,厦大历史所编著,厦大出版社,1989年。
- ③《福建航运史》,人民交通出版社,北京,1994年。
- ④同注③。
- ⑤市川信爱、戴一峰编《近代旅日华侨与东亚地区交易圈》,厦大出版社,1994年。
- ⑥同注⑤,132页。
- ⑦同注⑤,396页。
- ⑧王晓秋著《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北京,1992年9月版,348页。
- ⑨沈殿忠等人著《中日交流中的华侨》,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341页。
- ⑩实藤惠秀著、谭汝谦等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出版社,北京,1983年8月版,64页。
- ⑪同注⑩,71页。
- ⑫同上,据东亚同文会编《支那年鉴》,65页。
- ⑬同上,转引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上田万年语,65页。
- ⑭王晓秋著《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北京,1992年9月版,413页。